

从《任雨农全集》探知任雨农的教育思想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REN YUNONG”**

黎翠雯

LAI CHUI MU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18

从《任雨农全集》探知任雨农的教育思想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REN YUNONG”**

By

黎翠雯

LAI CHUI MU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MAY 2018

摘要

本文以马来西亚华教人物任雨农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一生在执教杏坛以及推动书法两大方面的活动，全面分析其教育思想以及为维护华文教育的经历，解读他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笔者将梳理其生平事迹，探根究底找出他教育思想的渊源，从而印证任雨农的教育思想有着儒家内涵。华文书法是随着华文教育和其他美术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笔者将对此课题作出论述，任雨农如何以文化书法表达其人文精神，把它灌溉在教育思想上并彰显文化教育者的角色。

接着，以任雨农作为此论文的研究对象，从《任雨农全集》上册、中册和下册作为研究蓝本探知任雨农的教育思想。笔者将以任雨农对华文教育、推广华语问题和书法运动，三方面去解读任雨农的文化教育责任。

通过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笔者试图深入具体地探讨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敏感的族群政治中的生存之道，总结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成为海外华文教育典范的原因及经验，并且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笔者亦希望以此推动海内外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

最后，总结任雨农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和一生的贡献，印证了他参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关键词：任雨农；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教育思想；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n YuNong, the Chinese School Teacher of Malaysia, study about his work and struggle 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analyses his educational ideal and experiences fighting for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his influence 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The author will sort out his life stories, find out the origin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ove that Ren YuN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Confucian connota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is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other fine arts education. The author will elaborate on this subject, Ren YuNong how to express his humanistic spirit of cultural calligraphy, irrigation it in 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highlight the role of cultural educators.

Then, taking Ren Youn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thesis, from Ren YuNong's Collected Books volume one, two and three as the chief source to discover Ren YuNo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author will interpre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education from Ren YuNong through three categories, which is: Chinese education, issue of promoting Chinese and promote calligraphy.

Through this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tudy in detail of how Chinese education survive in Malaysia's sensitive ethnic politics, summarizes the causes and experiences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s a model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author also hope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inally, summing up the influences of Ren YuNong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his contribution, it is confirmed that he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Malaysian's history, especially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Keywords: Ren Yunong;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educational ideal; influence

致谢

趁着一颗求取知识的心，尚未被生活现实浇灭之前，毅然再次进入学术殿堂，并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股不断自我提升的冲动。奈何人生，必须走过一些必然的阶段，才算完整。

六年来，经历了父亲的逝世，自己出入医院无数次的经历，在生病和经济压力下，想放弃了把论文写完。幸亏获身边人的支持，尤其是母亲及家人给予的鼓励、督促、询问，他们忧心忡忡的来电，都是我重新执笔的动因。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潘筱蓓博士。她的关心，让做学生的我有愧。感谢她在学业上给予指导、纠正、建议，并鼓励宽容我的犯错。感谢张晓威博士、陈中和博士、廖冰凌博士、何启良教授、林水椽教授和师母和王介英博士。

在硕士第一年，遇上何启良院长的掌院、巴杜卡周美芬学姐的领航，中华研究院承办和策划了多场研讨会，并在2012年第一次和研究生学会成员们到访福建厦门进行学术考察，同时参访多所大学，如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2013年，在巴杜卡周美芬学姐的领导下，和一群志同道合同学，成功举办了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会议。硕士的研究生生涯除了繁重的课业，我很感恩有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一起在哲思楼学习和进步，让我受益匪浅，增广见闻并开拓视野。感谢中文系研究生学会的创始人拿汀周美芬，她创造了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学会，真正开拓我的学术领域视野。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共谋策划研讨会、海外交流、实地考察等，他们是凤

娇、秋霞、丽华、丽珠、蕙青、欧阳、慧娴、逸敏、筱丝、宝平、振荣、素
娴、锡锐和一文等等。感谢陈凯希先生和陈健发先生的扶持和鼓励。

感恩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予所有的人。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为黎翠雯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_____

(潘筱蓓助理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14.05.2018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黎翠雯（学号：11ULM01595）在中华研究院潘筱蒨助理教授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从《任雨农全集》探知任雨农的教育思想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黎翠雯）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 名：黎翠雯

日 期：14.05.2018

目录

题目		i
华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致谢		ii
论文核实书		viii
论文提交书		ix
论文声明		x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		4
第三节 文献综述		16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任雨农教育思想渊源		20
第一节 任雨农生平事迹		20
第二节 任雨农儒家教育思想渊源		25
小结：任雨农的儒家教育思想		30

第三章	任雨农华文教育与文化书法事迹	32
第一节	任雨农与华文教育	32
第二节	文化书法	38
	小结：任雨农文化教育者的角色	42
第四章	任雨农教育思想的实践	43
第一节	生命孕育生命：一生心系华文教育	43
第二节	华族的根：扬弃方言，推广华文	46
第三节	传承与继承中华文化：推行书法运动	50
	小结：一生推动华文文化教育	51
第五章	结语	53
	第一节、 马来西亚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54
	第二节、 任雨农教育思想的影响	55
	第二节、 此课题的目前局限及未来发展	58
	参考书目	61
	附录 1	65
	附录 2	68

第一章 绪论

任雨农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书法家、作家，更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华文教育、华文报纸、华人社团素来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在三者之中，华文教育担负了保存华语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深深影响了华族的发展。在马来西亚教育史上，广为人知的有先驱者“林连玉先生”和后期的“沈慕羽先生”。他们都是属于教育界中的重点主流人物。而鲜为人知的非主流华教人物任雨农，却较少人提及。本文以马来西亚华教人物任雨农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一生在执教杏坛以及推动书法两大方面的活动，全面分析其教育思想以及为维护华文教育的经历，解读他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通过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笔者试图深入具体地探讨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敏感的族群政治中的生存之道，总结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成为海外华文教育典范的原因及经验，并且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笔者亦希望以此推动海内外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它不完全是由人们的所说而描绘，主要是由人们的所做而铸成。要想更好地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过去和现在，展望它的未来，必须追溯历史，通过一系列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在人物和时代、环境互相牵动、互相影

响、互相制约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人物，这是早从中国史家司马迁著《史记》，“本纪”、“列传”占全书十之七八开始，过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中国二十四史都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中就已奠下并已为大家所接受的史观。（周美芬，2013:1）

梁启超甚至曾经提出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历史、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来改造《通志》的说法（梁启超，1967:234-236），说明了人物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而基于每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着特有的条件限制，而重要且具代表性人物的活动也必然影响着和他们同时代的群体，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能不了解时代，评价历史人物更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征。当我们把人、势、环境与群体联系起来，互动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全面地展现。（周美芬，2013:2）

在马来亚，南洋华人社会原本是个移民社会。南来的先辈虽多为目不识丁的草根群众，但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移居南洋后，依旧保持了儒家的许多行为规范。因此，我们可说先辈们挟带着儒家文化传统前来南洋。

本论文研究的主角任雨农（1911-2009），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书法家、作家，更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任北海中华四校校长、槟城钟灵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华文教席、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范学院、南北马华假期师训班华文与中国文学及教育讲师。任氏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以儒家思想为他一生的价值观，而且积极地社会推动儒家思想。目前，研究任雨农的学者，一般都注重任雨农对南洋社会、教育、社会改革等诸方面的贡献。但似乎忽略了他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他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而这思想影响直至他人人生，无论是在他的生活、家庭还是教学上都能体现出来。若我们未能掌握潜伏在任雨农身上的儒家思想，或没有发掘他在这方面的核心思想，那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更好的解读他的思想与行为及其为社会所做的一切。换言之，我们将无法全面了解任雨农这号人物。而这儒家思想深刻地实践在其教育思想上。古云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身为“人”，这一生中最高境界就非前面这句话莫属了。立言，他通过文章把一生所思所学的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立功，他在教育界培养了无数的学生，有当官的、有医生还有许多教师和企业家的，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立德，他亲力亲为，由书法义展和以身作则的教导学生为后人立下了典范和德行。

即使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老师、书法家、马华作家、马中友好代表等等。但他始终最重视的还是教育，这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巨大关系。他个人在教育上所作的努力，使南洋和中国的华人都获益匪浅。多年来，他鼓吹教育、任职各院校

教职、积极推动书法活动、维护母语教育等，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是他最为注重的部分。

第二节 前人研究

本文的主角任雨农（1869-1957）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集教师、书法家和马华作家于一身，但他最让人啧啧称奇之处，即以儒家思想及价值观贯穿其一生。有不少学者提出任雨农毕生经历冲击与矛盾，在不同时期有着复杂多变的“身份认同”。然而，笔者认为，任雨农在南下到马来西亚，以其个人的主观意识，依重要性层次，选择了文化认同，确认了儒家思想为为人的导向。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任雨农在拥有多重身份下，得以从容的应对不同文化交汇下所衍生的现象与难题，并跨越地域（中国和南洋）、种族（湖南长沙人和马来西亚多元种族）、阶级、宗教等身份认同的迷思，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展现其君子不器的风范。

颜清湟教授在为李元瑾博士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写序时表示：“近年来，海外华人的经济和商业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热点。但有关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研究，却凤毛麟角。”（颜清湟，2001：251）。根据颜清湟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尤其在书写一位人物，不能忽略了知识分子这一批人。

何启良教授也曾说过：“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概念看起来好像很狭小，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可以讨论的范畴其实很大。从学科分类来说（历史、文化、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它拥有非常多的研究视角：若从理论、方法、语文书写、中国/本土、资料收集等等各方面来谈的话，更是广阔。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更增加其复杂性和可研性。”（何启良，2007：231）

“我们必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来行研究议题，而不能用没有本土关怀的中国“大中华”心态和意识来切入问题，不然的话，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将会与马来西亚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而沦为“华侨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点缀的研究成果。”（何启良，2007：236）。何启良教授以上论点，为华社在这课题的处理上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的依据。

因此，在选择历史人物研究上，我们不能忽视了知识分子这一批人。本论文研究的对象任雨农（1911-2009），是名文人、书法家更是一位老师，是适合归纳为知识分子这一类型。更何况他在马来西亚是少数的湖南长沙人。相较于早期以福建人居多的活动圈子的槟城华人社会中，他更具有研究价值。他的行为举止更能反应和还原当时槟城社会的原貌，身为南来的先辈的他，在促进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互

谅与融合方面，扮演了更重要与有效的角色。在华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因此必须涵盖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在东南亚新兴的国家中，“身份认同”（Identity）常困扰着许多华裔的东南亚公民。作为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少数族群，他们的身份认同常被当地政府和土族人士怀疑、歪曲。甚至被利用为政治武器来攻击他们。“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名词，强调主观意识对事物的自我定位。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包括种族、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国家、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认同等。“身份认同”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种类。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对该国家效忠并履行公民的责任，但同时可以属于不同的种族，认同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阶级和社会群体。它们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冲突（颜清煌，2012：11）。

根据学术界的界定，华侨这名词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末，广泛使用于 20 世纪初。华侨是一个过时而又丢不掉的名称。在《“华侨”一词名称考》中关于“华侨”相关的问题和论述，“华人”便是“华侨”变化的产物，也是“华侨”的延伸，是从“华侨”中裂变出来的，反应出的就是变化著的世界及其环境。“华侨”与“华人”有著共同的“根”，这就是中华民族，它们都是这个根在海外结出的果实。早期有“华侨”、“华人”虽然改变了国籍，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但却永远

割不断与中华民族这根的血脉联繫。“华”是象徵，也是標誌。当世界还有种族与民族的区分时，这个標誌始终会存在的。

严格而言，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范畴。为了方便讨论，可采用伯格（P. Berger）的话作一概括性的引介。伯格认为，身份认同是社会授予、社会维持和社会转化的（socially bestowed, socially sustained and socially transformed）社会心理（Berger, 1966）。也即是说，身份认同既代表了整体社会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它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且会因应社会变迁而改变。从理论层面上看，一种身份的建立，主要受两大层面的因素所左右：其一是先天的、主观的；其二是后天的、客观的。就先天或主观而言，由于台、港、澳人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和文化怀有一定感情，因而可能“理所当然”地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上的身份投寄，又会受到后天的、客观的因素，如权力互动、法律规定和族群角力等所左右。对此施达郎说得十分清晰：要分辨一个人是否“中国人”，须从两个角度观察。客观方面，如果当其他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时，你纵然极力否认，也百口莫辩；主观方面则是你自认是中国人，即使其他人不承认也无法改变你的信念。一般人论定某人属何国人的客观标准，往往根据血统、肤色、生活习惯和思想方式。许多华侨

（主要为第一代移民）虽然加入了侨居地国籍，但仍然以“中国人”自居，这是基于民族意识的驱使（施达郎，1980：5）

简单而言，身份认同是指出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那一种类属，不属于那一种类属的规化活动。而且，在研究任雨农儒家教育思想时，身份认同、国籍认同和文化认同是需要一起进行分析。因为身份认同有分“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这会随着当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有所影响而出现矛盾，是一种“我是谁”的身份确认，这必须建立在文化与历史的大活动中。身为一位从湖南长沙南下的华人，任雨农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身份认同	国籍认同	文化认同
还未到马来亚	中国	中国	中国
来到马来亚	中国/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中国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任雨农在还未南下到马来亚时，他的身份认同、国籍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中国。而后，他因为战乱来到马来亚后，他的身份认同从中国变成了马来西亚，这里就发生了矛盾点。为什么说他的国籍

认同是马来西亚？是因为他接受了马来西亚的国民身份，这是他的国籍认同。而文化认同，笔者认为是中国，是由于他自身的学习过程，而有着对中国文化认同。这文化认同来着他一生中受教育的程度而铸造出的文化思想。这点也是本论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然而，在另一方面，王庚武依据华人对中国政治、殖民政府和本土政治的认同，将华人分为：以中国为关怀重点的 A 类型；冷静务实，尝试和各方都取得合作的 B 类型和倾向效忠马来亚的 C 类型。他按大环境的发展，把从 1870 到 1970 年的百年，分成：（一）1870（1895）- 1905 年 35 年间的本土统治时代，迟疑与不愿改变的年代；（二）1905（1911）- 1945 年（1942），长达 40 年的殖民时代到日治时代，中国国内革命情绪高涨，马来亚华人逐渐融入新的英殖马来亚法治与经济制度的时代和（三）1945 - 1970 年 25 年间的新中国成立和马来亚建国时代，并把华人放在三个不同时代的大环境下检视，看华人如何回应大环境的改变而游走于 ABC 三种类型间、华人在不同环境下的形态、身份与政治认同。（王庚武，1970: 1-30)

接着，颜清滢从人的主观意识和时空的变动角度，讨论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演变。他把马来西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一）1912 年以前的阶段；（二）1912 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阶段；（三）战后到 1957 年马来

亚独立阶段，并以此检视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演变。

他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主观意识对事物的自我定位，它包括许多不同种类，如种族、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国家、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认同等。“身份认同”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种类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个人的主观意识、性别与职业和时空的变动，人对自己的各种认同有轻重层次的分别，而当时空变更时，一个人对各种认同的重要性有所改变是正常的。

（2012年6月9日）。

以下的图表收录在何启良教授《马来西亚人物志》，而任雨农是属于（C 例子），他拥有马来西亚国籍并在马来西亚以外(区域、世界)有着影响力。

表（一）1957年以后马来西亚国籍和人物活动影响交叉图

	国籍		
		非马来西亚国籍（更换或其它）	马来西亚国籍

活动、 影响	马来西亚	B 例子: 颜清湟、黄锦树	A 例子: 林良实、林吉祥、林碧 颜、陈平
	马来西亚以外（区 域、世界）	D 例子: 王赓武、何丙郁、李永 平、仇志强 1	C 例子: 古润金、杨紫琼、蔡明 壳、李健省

（何启良，2015:A26）

表一：为 1957 年以后马来西亚国籍和人物活动影响交叉图。国籍与非国籍之间是相互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然而马来西亚、区域、世界则是有连续性（continuum）的。也就是说，一位在马来西亚活动或有影响的人物，他可以也是在区域或世界有影响的。本书收录人物还是以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为主，其主要活动地区和冲击在马（即 A），同时也收录拥有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身份在国外（在马来西亚之外）有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即 C）。本书也 兼顾那些对本地或本

地以外卓有贡献与影响的非马来西亚国籍人物（即 B、D）。这样的编辑思考，还是属于一种以历史进展和社会史 的角度的思考。许多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问题，并不是简单采用 “国籍” 范畴就可以解决的。

以下的图表是由著名画家钟正山之女儿钟瑜提供，收录于何启良教授《马来西亚人物誌》，此表带出了从 1900-2000 年，华侨到华人华侨、华侨/华人、华人/华裔身份认同的演变。社会思潮；国籍、 国家、认同政治领域；教育领域；经济领域社团领域；文学艺术；宗教领域；学术；科技、法律、体育的分析。在探讨“身份认同” 的课题上可作为参考。

表（二）《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历史脉络演变特征

	马来西亚人物志一一百年	
身份 认同 的 演变	华侨-----	华 侨/华人..... 华人/华裔

百年 社会 变迁的 分期		1900- 1930	1930's- 1950's	1950's- 1990's	1990's-2000's
社会 思潮	中国 思潮、 英国 殖民地 地思 潮	华人移民 社会	在地化思想萌芽	马来亚化—马来西 亚化	走出马来西亚、国 际化
国 籍、 国家 认同		回 归 中 国、认同 英 殖 民 地 政治	居留时间较长、 定 居 下 来	入籍	土生土长
政治 领域		殖 民 时 代 、 领	抗战、马共、马 华 公 会	华人政党成立、参 入政治 朝野运作	多元与纷争

		事、甲必丹			
教育领域		崇儒兴学 一中国南来、留学中国、英式教育	同	-英文源流教育、争取 华文教育、国民教育 一留学欧、美、日 一留学台湾	一华文、华人高等学府 1 一留学中国、港台、
经济领域		树胶、锡矿、贸易	大战、经济萧条	中小型企业	新生代企业家
社团领域		宗乡亲会馆	与政治、经济、文 教艺术结合	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	同
文学、艺术			南洋文艺思潮	马华文学、南洋美术	发展成熟期一一走出马来西亚、国际化
宗教领域		民间信仰	儒、道、佛、基督	儒道佛、基督天主教+回教	多元
学术			中国学人在地化	在地学者形成	学术扎根一一与国外学术机构、学者

					联系
科 技、 法 律、 体 育				40-50 年代留英法 律人才 50 一留欧 美科技人才 60 一 体育人才	高科技

(此表由钟瑜提供。)(何启良, 2015:A34)

就研究视角的掌握, 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合编, 2003)全套三本, 分别以《创业与护根》、《承袭与抉择》、《匡政与流变》为名, 由数十位学者, 以马来西亚政治、商业与文化三个领域中, 功绩显赫的华人为研究对象所写的人物专文集, 从总主编与各主编的序与绪论、各人物专文中可以掌握到马来西亚华人人物研究的发展脉络, 其意义都有待开发的空空间。各学者所采取的不同研究视角可作为本研究的学习与参考。任雨农除了一些自己的著作外, 几乎未见前人的研究。他著有《风雨南州》、《江山灵秀》、《青山云外》、《海天云外》、《生活的旋律》、《江山万里行》、《乱弹曲》、《缩不住的春风》、《湘芬堂诗词集》及《任雨农书法集》等。然而, 收集最完整的只有《任雨农全集》, 因此这些相关的专书、文章和演讲词被视为最基本和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本论文所依据的重要材料。

本研究秉承上述观点，选定了在马来西亚百年历史中，为我们留下珍贵记忆与启发的任雨农作为研究目标。

第三节 文献综述

本章主要探讨任雨农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际遇。笔者尝试通过其所处的时代，探索他和时代的互动、时代对他的海外华人属性与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以此进一步窥探其在教育实践上，坚守宣扬儒家思想之路的缘由。

由于尚未有前人研究任雨农的教育思想作为范围。碍于能力与时间，资料收集工作仅局限在以中文书写的专书著作方面。虽然在收集到的中文资料中，未见有前人探讨任雨农教育思想的论著，但因未能涉及以其他语文撰写的资料；加上其中涉及华侨华人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华侨华人”非学科，只是研究领域，所以没有自身独有的研究方法。因此只能借鉴以及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期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因此，本文所做推论当有不足之处。

在华文书法方面的研究，根据学者陈玉佩《近百年来华文书法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中，她仔细梳理了华文书法这一百年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和发展。她说

道：“近年来，研究华侨华人文化历史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教育等角度进行探讨，并已在文学、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但是对该地区书画艺术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于本地华文书法历史的研究，更是不大被人重视。例如马来西亚唯一的一本以中文为主的艺术刊物《艺术走廊》，刊登有关书法的文章还是少数的而且仅限于一般书法活动、书家生平的介绍。另外一本自誉为马来西亚唯一华文思想人文综合杂志的《人文杂志》季刊，竟未曾刊登过一篇有关本土书法历史研究的文章。其前身《资料与研究》也是如此。而1999年钟瑜所著《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书法并不列入考察的部分，只是附属于水墨画中。其他有关文章，大部分皆以书法入门、学习心得为主。很显然，华社对书法艺术的关注仅限于文化的传承，对本地书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如何继承中华文化与书法的未来发展尚未认真思考过，也未公开地讨论过，目前仅停留在本土书法的提问上。而中国学者对此更是少人关注，有关的介绍文章极少，更谈不上研究，以致人们对于马来西亚的华文书法的认识仍然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因此，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研究中华文化的继承与本地书法艺术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帮助人们认清本地书法发展的历史，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延续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促进华文及汉字教育的发展，激励马来西亚华人重视本土文物及维护史迹之概念，提升本地华人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水平，激励当代书法家创作与研究之风气，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了解马来西亚等国华文书法艺术

的历史与现状，还有中华文化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促进中、马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陈玉佩，2005：2）

而以历史环境的背景下，在黄贤强所编的《槟城华人社会与文化》反应了早前槟城华人社会的原貌。当中有相当多的古籍和数据可以供这论文参考和引用。

第四节 研究方法

首先，采取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希望善用此方法能从《任雨农全集》中找出任雨农的教育思想线索，从中印证其教育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文章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即使文章自写出后，脱离母体，但多多少少必定有其作者之思想和情感所在。笔者相信文章必有我的说法。因此，企图通过研读《任雨农全集》中所收入的文章、演讲稿、诗集等，全面探讨剖析当中所呈现出的故国情结，或者是从中找出他对马来西亚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借此看出和分析他对故国的情结。这部书提供有关故乡情结线索，让笔者可以沿着那条线索找出论文的资料。但碍于时间上的限制，笔者目前无法深入研究。在线索收集、翻阅、细读、欣赏到分析，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真的针对本论文所研究的主体做出中肯和客观的论述。整本论文的构写，耗费最多时间在于文本分析这部分。

在文献收集研究方面，其主力主要落在《任雨农全集》，次要集中于文化著作、马来亚/西亚历史著作、剪报、华侨华人研究著作、论文和网络资料。希望借此能全面进行撰写工作。至于任雨农曾担任主编的《南风月刊》，由于历史久远，目前仍在搜寻其下落。《南风月刊》里头的文章直接影响论文里一章节的论证，因此非找出不可。目标锁定其出版地“檳城”、马来西亚档案局、马来西亚图书馆、新马设有中文系课程的大学，希望能找出。如无法找出，此章节有其不足之处。

第二章 任雨农教育思想渊源

笔者认为任雨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综合现代新思想，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此章节将梳理其生平事迹，探根究底找出他教育思想的渊源，从而印证任雨农的教育思想有着儒家思想的内涵。

第一节 任雨农生平事迹

任雨农（1911-2009），字湘圃，祖籍湖南长沙，（戴小华，2006：307）是马来西亚少数的湖南长沙人。幼年时居住在湖南的港镇挂榜村。他出生于1911年，在1840¹年鸦片战争后至1911年的那段时期，中国因各种战乱及天灾等，造成大量的华工移民南洋谋生，此时期的华人与旧时期移民的海峡华人结合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华人社会。他的一生，不算传奇，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是名怀才不遇的书生；他没有商人的铜臭味，有的是身为书生的清风傲骨和不畏权贵的高尚精神。根据资料

¹当时南来的先辈大部分是草根阶级的，因而在南洋形成了属于劳动群体的移民社会。1851至1891年间曾在海峡殖民地居留的沃恩（Jonas Daniel Vaughan），谈到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职业从事情况时说“华人可以说无所不能；他们是伶人、卖艺者、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书记、管账、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员、传教士、僧侣、医生、教员、客栈主人、屠夫、猪肉贩、胡椒与甘蜜种植者、糕点贩、牛车与马车主、布贩、酿酒者、餐饮店主、鱼贩、水果贩、渡船夫、卖草者、小贩、商人与代理、油贩、鸦片馆主人、当铺商、售猪肉者、家禽者。他们是米商、船具商、店员、总销售商、酒店店员、仆人、木材商、烟草商、菜贩、种植者、市场菜圃人、劳工、烘面包者、磨坊主、理发师、铁匠、船夫、装订书者、鞋匠、木匠、家私匠、马车匠、修车匠、牛车与马车夫、烧炭者与炭商、棺材匠、糖果商、包工与建筑者、桶匠、司机人与火夫、渔民、金匠、枪匠与锁匠、烧石灰者、泥水匠、席与篮编织者、榨油商与矿工。除此之外，还有油漆匠、灯笼匠、搬运工、磨豆者、印刷商、碾莪、糖与甘蜜制造商、锯木匠、海员、造船匠、肥皂制造商、石匠、制糖者、裁缝师、制皮匠、洋铁匠、黄铜匠、制阳伞者、承揽殡葬者与墓碑匠、钟表匠、挑水者、樵夫与火柴商、雕木匠与象牙匠、相命者、杂货商、乞丐、流氓与小偷。”（Vaughan, J. D., 1971: 15）。

所得，1937年生命如日中天的任氏，因为在中国的怀才不遇，便随着朋友乘船南下马来亚，定居在槟岛，开始了他在马来亚²的生涯。

任氏高中毕业后，便考上了湖南大学。由于当时他没钱缴学费，便改进湖南师范学院，过着“一年有两套校服、两双皮鞋、衣食住宿全免，另有 3 元 8 角零用钱”（何雪琳，2009：14）的清贫生活。毕业后，他便只身到湖南醴湖县立师范学院教书。

在他执教期间，国民党政府执政，统治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给人们的只是
一些美丽的描绘的蓝图。实际上，当时人们饱受精神压迫。身为华文老师的任雨农
课余常在报章发表文章，有次却得罪了教育厅长。（南洋商报，2009：14）如果笔
者没有推断错误，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刊登于湖南《国民日报》中的〈政治人物左右

²根据何启良《马来西亚人物志》在定义“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概念里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地理概念，1963年才在政治史上出现，包括东马来西亚（沙巴及砂劳越）、西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两个区域。之前马来半岛称为“马来亚”，这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地理概念。“马来亚”专指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19世纪20年代起，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马来亚”对英国殖民政府来说是一个行政概念。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是英国在1826至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最初由新加坡、檳城和马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26年决定整合在马来亚的三个港口属地，新加坡、檳城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于檳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二次大战期间，马来亚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了殖民统治。1948年2月1日马来亚成立联合邦，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此后一段时期内的“马来亚”也是指马来亚联合邦的国家名称。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砂劳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此后的“马来亚”只是指西马地区。

教育》的论文。（戴小华，2006：307）。当时，政治人物支配着中国教育界，使他不得在报上再发表文章。他说过：“那个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总觉得知识青年不能受压迫的。”（何雪琳，2009：14）如此的遭遇，让他有怀才不遇之感。

1920年至1930年代的中国，许多中学生、大学生、知识青年、年轻教师、教授都受到政治压迫。任氏曾说道：“那时局势相当乱，让人觉得非常恐惧。有些人被捉去，没审判就遭监禁；还有一些老师放学回家，吃过饭以后就不见了。第二天没来，怎么找都找不到。”（何雪琳，2009：14）

当时，他碰到从槟城³回长沙的高中同学。同学以各种优渥条件游说他南渡；另一方面。（何雪琳，2009：14）另一位同学从延安回到长沙，鼓吹共产思想——

³ 《檳榔嶼紀略》提到“光緒七年辛巳（1881年）人民一十萬零五百九十七口，內有華人六萬八千二百，計居檳榔嶼者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居威烈斯烈（筆者按，指成斯利）者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九，居顛頂（冕者按，指天定）者四百六十六，其居檳榔嶼者計福建人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海讀二千一百二十九，客籍人四千五百九十一，廣府人九千九百九十，潮州人五千三百三十五，土生五萬九千二百零二，其居威烈斯烈者福建人二千六百八十，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客籍人二千三百一十二，廣府人二千一百一十二，潮州人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八，土生華人一千二百七十五。這段史料告訴，1881年時在檳榔嶼華人當中（包括威利省在內），福建人數量最多，達到16568人，占華人總數67354人的24.6%，接近當地華人總數的1/4。如果加上土生華人（主要為福建人），比例將會更高一些。

海峽殖民地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1894至1904年各年度報告示，在絕大多數年份中，從廈門港口出發移民檳榔嶼的人數比從香港、汕頭、海南、上海、北海等中國其他港口移民檳榔嶼人數要多。從廈門港移民到檳榔嶼的華人人數（大多數應為福建人）11年合計155,371人，年均約移民14125人。其中男性移民139,259人，占89.6%，年均約12,660人。“（王付兵，2009：69；王付兵，2012：35-41）。

如果不想辜负青年的生命，就应该到延安参加革命，不要自私自利，要牺牲小我的生命，挽救中国的生命。（何雪琳，2009：14）

结果，任氏心中盘算：南来物质条件好，去延安就要预备牺牲。他心里害怕，反观当时中国国内的留学生少，所以他原想先去槟城教书5年，边存钱边学英文，过后再去英国磨练，回国当官，好有一番作为。从中国舟车劳顿飘洋过海千辛万苦到新加坡再辗转到槟城，第一眼见到槟城，故国情结深重的他感慨万千，当场落泪。

任雨农南来不久，中国开始内战。1934年年中，任雨农凭着一股热血，一边教学，一边与几位中学华文教师联合创办“南风杂志社”，出版《南风月刊》。

（何雪琳，2009：14）他们一方面宣传中国抗战，另一方面唤醒海外华裔子弟，为挽救当时中国的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物质和生命。

为了维持《南风月刊》的出版，任氏出任总编辑，所有中学老师撰稿亦不收稿费。可惜，1939年10月，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政府（三州府）总督以《南风月刊》“维持民族之间的安全，避免破坏和平社会”的原因勒令停刊。（何雪琳，2009：14）《南风月刊》不得已于1939年10月宣告停办，任雨农因而投身教育

界。每当回想当时的执教生活一样苦不堪言，他苦笑：“人家说教师像一头牛，我说不是一头牛，是一头犀牛。”（何雪琳，2009：14）这句话，也印证了他执教生涯中的艰辛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和毅力。

1940年到1941年，当郁达夫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与“繁星”时期，任氏发表不少散文和小品，间亦抒写旧体诗词。三年八个月东南亚沦陷期间，任氏与夫人陈月莲于太平市郊外的树胶园里，胼手胝足制作虾饼出售，艰苦渡过战乱岁月。（戴小华，2006：307）

日军战败投降后，任氏受聘为北海中华公学校长，之后任教槟城⁴钟灵中学，后来受聘于太平华联中学，继而受教育部推选出任吉隆坡语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讲师，自1947到1962年期间，任氏受教育部聘请，兼任太平、吉打、怡保、新山等华校假期师资训练班华文、教育学讲师。（戴小华，2006：307）他于1970年退

⁴棋城，一名庇能，英文名 Penang；初名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首邑名乔治城（Georgetown），后以岛上盛产槟榔，故名槟榔屿。1786年，吉打苏丹将槟榔屿割让与东印度公司代表，英国上校佛兰西史莱特（Francis Light），成为英国最初在南洋的殖民地与商业根据地。此后，英国人积极发展槟榔屿的实业和交通；到了1789年，入口货物价格已达六十万元。1791年，吉打领袖率领八千兵士攻击槟榔屿，莱特上校仅以四百名兵士平定此乱，从此地方安谧，商贾云集。1801年，英国人在槟榔屿增设海关，征收税项，但商人民众苦不堪言，因而于1826年废除。1805年，英国人将槟榔屿划为一省，直隶东印度政府。1826年，英国人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星加坡合为一个行政区域，即海峡殖民地，政治中心首设于槟榔屿，1836年移至星加坡。由于槟榔屿地点适中，往来欧洲、印度及中国的轮船，都会在槟榔屿停泊，而岛上又盛产香料、烟草、树胶、锡、糖、米等物资，因此，槟榔屿的地位，仍然极为重要。1920 - 1930年代的槟城，基础设施如道路、学校、医院、社团、报馆、戏院等，均已完备，并且还有许多旅游景点，不仅是当地人民消闲的好去处，更吸引了不少海外游客前往观光。

休。（戴小华，2006：307）退休后专心著述，诗词散文，散发文学的高雅逸致，缔造人间的真善美。他是教育界的光辉，是文学界的璀璨。他的著作，有教育部发行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唐诗三十首笺注》，中国北京再版的《湘芬堂 诗词集》、《风雨南洲》、《江山灵秀》以及《青山云外》、《生活的旋律》、《任雨农书法集》、《海天云外》等。

任氏一生最大贡献是在华文教育，为文教团体如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宽柔华文独立中学及新纪元学院等举行义展，也经常在报章上发表杂文、论说文、散文，是家喻户晓的文化人，声望甚高。退休后，他才专注于书法，经常担任槟城州内及全国性的书法比赛评审。曾代表马来西亚在韩国与马来西亚书法交流会上，发表《略谈中华书法艺术》一文。其书体以清瘦为主。

第二节 任雨农的儒家教育思想渊源

当时南来的先辈大部分是草根阶级的，因而在南洋形成了属于劳动群体的移民社会⁵。纵使生命中有高低起伏的际遇，任雨农身上携带着的中华文化的基因，促

⁵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则是一个高峰期，东南亚各地相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华人社群，因此开始受到清政府的关注。尽管相当一部分华人已经在海外落地生根好几代，但他们在情感归属上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清政府也视之为自己的海外子民，不断派出外交官和考察官员，以示对海外子民的关注。此外，一些文人游客在游历海外的同时，也对海外华人社会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清政府外交官的奏折、考察官员的报告加上当时的文人游客的日

使他学习及实践儒学。因此，笔者将根据任雨农一生的思想行为，从他的成长过程、当时的政治时局、学习背景、教育及著作的部分，剖析他对教育、文化、宗教的认同，从中探寻其儒家思想如何在其教学活动和生活上实践，并经由此肯定任雨农推动儒家教育思想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

任雨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综合现代新思想，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身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经常回到中国湖南长沙和岳麓书院进行访问和旅游。他肩负宣扬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生命价值的使命。任雨农亦是一位教育家，立志以教育弘扬传统文化。

在《任雨农全集》中，就有文章谈论到关于儒家思想的，如：〈由儒家思想谈起〉和〈孔子的教育两翼〉。任雨农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仁”。他认为“儒家”，要提倡孔子，因为孔子是儒家之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儒家学说思想的荟萃。

记随笔，从外围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另一番景象，使研究者得以透过他们对海外华人的关注，从侧面来研究海外华人。余定邦、黄重言等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是目前为止汇集这方面史料较为齐全的一部资料汇编。

在〈由儒家思想谈起〉一文中，他写到“仁”是孔子思想体系核心。“儒家思想的精义，都在这四部经书裡，等待你去认识体会。认识了它的精义，体会了它的内涵，还是不够，要看你如何去体现，如何体现到现行的政治上，制度上，没有不平、不公、不均、不安，全体人民心平气和的愿为国家出力，愿意看到自己国家达到富强局面，这也是孔子的意愿。”（刘庆伦，2013：400）

他认为，孔子生在变乱的时代，却能同情人民的痛苦并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任雨农在文中强调“仁爱”、“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推广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都符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成人、成圣、成君子的逻辑。

然而在〈孔子的教育两翼〉一文中，他提出两点：一是学，主观上强调学，学不厌；一是教，客观上强调教，教不倦。孔子重视“学”。《论语》首篇为〈学而〉篇，开宗明义已言“学而时习之”。孔子本身即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孔子好学与为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看重学习的精神。像孔子、朱熹、孙中山、曾国藩等这些有学识涵养的知识分子，指导他为学和做人的道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优秀老师对学生的悉心栽培与默默付出，将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促使任雨农往后成为了教育家，并在马来亚、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书法等各领域的教育工作，从而回馈社会、报答恩师。纵观任雨

农一生所思所为，他坚信教育得以为国为天下培育君子。这些经典深深影响了任雨农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家庭观。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可见他反对冥想，反对唯心的思维方法的。“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非生而知之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便是强调学。他的“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表示他一生都在敏思求学中生活，可是他无法突破那时的时代性。（刘庆伦，2013：405）

任雨农认为孔子除了提倡“学”，“好古”“好学”外，孔子最注重是“教育”。而这个教育并不是机械化的，是“因材施教”。他形容孔子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而儒学最核心和根本的精神是“教育”，而立志习儒与致力培育“君子”更可谓是任雨农的志愿与理想。

“孔子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不是机械式的，“因材施教”，他的施教是著重学生的天性、资质、勤惰以及兴趣和志向，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总希望学生受益，希望学生的气质逐渐提升，这样崇高的教育爱心，所发出的光对后世有没有起激发作用呢？但我总希望“因材施教”的灵活教学法益以今天的科学智识，在教学进程上能收到真正效果。”

(刘庆伦，2013：406)

我们可以由此解读任雨农身处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社群时所给予的关怀行为正透露着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任雨农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停顿在道德修养的层面而已，他进一步勉励学生与世人完成个人修养，是为了社会做出贡献。对他而言，一位有仁德的社会领导人将由狭义的家族、家乡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观念，进而有了“为天下人”的抱负。

任雨农一生中在教育界和文化界，为社会、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卓越的贡献。教育，丰富了任雨农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亦赋予了他使命感，使他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位教师。良好的中华文化教育基础为任雨农的锦绣前程铺路，让他得以逐一实现理想与抱负。因此，任雨农一生致力于教育。

任雨农是一位知识分子，由于他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认识，也在在的影响了他的为人与志向。此外，儒家思想也成为他跨越族群、地域和语言藩篱，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的核心价值。

要理解任雨农的儒家思想，还必须充分认识他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之路。任雨农如此不懈于教育事业，在于他认为儒学最核心和根本的精神是“教育”，尤其是德育方面。放眼世界各地，包括当时的中国教育却将儒学传统及中国文化精神抛弃了，任雨农期望能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及言传身教来重塑孔学的真精神，并延续传统教育的命脉，这不仅为国家栽培人才、精英，更为社会培育出“君子”。

小结：任雨农的儒家教育思想

任雨农认为儒学最核心和根本的精神是“教育”，而立志习儒与致力培育“君子”更可谓是任雨农的志愿与理想。我们可以由此解读任雨农身处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社群时所给予的关怀行为，正透露着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任雨农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停顿在道德修养的层面而已，他进一步勉励学生与世人完成个人修养，是为了社会做出贡献。对他而言，一位有仁德的社会领导人将由狭义的家族、家乡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观念，进而有了“为天下人”的抱负。

任雨农的足迹烙印在南洋和中国，并在文化界、教育界与马中关系上，尽了个人最大的力量。此外，他也出版杂志和报纸，推动书法运动、举办座谈会及讨论会，向大众发表的演讲课题涵盖了各种的时事课题。纵使任雨农的专业在于教育界，但他不局限自己在教育界，而是进一步突破自身的局限，将触角伸展到其他领域，向社会大众展现其多面性的才能。

他坚信儒家思想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正是因为任雨农一生所作所为不仅仅局限在其南洋子民、华人的身份，他同时也投身于社会、文教界中，这使到他的贡献与影响，跨越社群，跨越地域，自觉地怀抱了儒家“为天下”的胸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成人”、“成圣”、“成君子”，“不为良相要为良医”。意思就是说当官要当位好官，若无法当官就要当位好医生，服务社会，贡献人群。最后，笔者不得不强调，任雨农并不局限于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政治取向，也不牵涉入其中的文化冲突上，这是因为他怀抱的是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君子为天下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任雨农终其一生的依归，惟有了解他的儒家思想，方能更全面及深层的认识与展现任雨农教育思想的内涵。

第三章 任雨农华文教育与文化书法事迹

华文书法是随着华文教育和其他美术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以下的章节将对此课题作出论述，任雨农如何以文化书法表达其人文精神，把它灌溉在教育思想上并彰显文化教育者的角色。

第一节 任雨农与华文教育

“海外到处有华人，有华人必有华校。”这是马来西亚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先生对海外华侨注重办学兴教历史的精辟概括。据有关资料显示，华人移居海外已有千多年的历史，约有三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世界约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侨、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不同方式的华文教育活动。早在二、三百年前，广大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便开始创办华文学校。到辛亥革命后，已涌现出一大批华文学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球掀起汉语热的浪潮，华文学校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世界各地。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华文学校遍布全国。但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以旧式的私塾教育为主，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孝经》等典籍，同时

也教授 书法和珠算。直到 1900 年，华校因中国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开始蜕变， 纷纷建设新式的华校以取代旧式的学塾。

根据学者廖文辉《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一书中，他提及：“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研究领域里，主要可分两个研究方向，一为以华教的演变和发展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另一为以华教人物为主导的人物研究。”⁶（廖文辉，2007：5）

任氏曾担任 4 年的公学校长，后来由于学校人事纠纷，而他受钟灵中学的邀请转而感到那里执教。不久，政府就下令学校改制，实施改制中学政策。钟灵就是当时被改制的第一所中学。钟灵中学的创立是由檳城阅报社的一批社友所创办，该社乃清末孙中山先生与“侨界先觉”合办的“革命机关”。因此，钟灵的创校和中国国民革命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钟灵从第一任教务长顾祥麟开始，就特别重视英文科，与中国教育传统有所差别。重英轻华的办学方针，到了陈充恩时代成了钟灵的传统，再到汪永年的

⁶在第一个领域内的研究，从早期王秀南、陈育崧到最近的郑良树，基本上已经建构出一个华文教育发展史的分期模式。至于第二个领域的研究，相对于第一个领域而言，则较为淡薄，研究也比较着重在少数几个较为突出的人物，如陈嘉庚、陈六使、林连玉等人。至于针对华教史上人物的综合比较分析研究迄今可谓一片空白。”

年代，也是如此。这在马来亚华教圈子，可谓独树一帜。因此，它也成了政府改制中学政策底下的目标。

根据 1960 年《拉曼达立报告书》⁷的一项建议：从 1962 年 1 月 1 日起，政府应该停止拨给中学资助金，只有那些已改制为国民型中学的学校，才可以获得政府的全面资助。那些拒绝改为国民型中学的学校将不附属于国家教育体系，而成为“独立”学校。（林水椽，2000：339）《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后来被写入《1961 教育法令》⁸（甄供，2006：94）。除此之外，1956 年《拉萨报告书》的“最后目标⁹”（林水椽，2000：339）也被纳入法令条文内，从而建立我国的教育制度，也促使华文独中的形成。这份报告书于 1962 年实施，当局即大事宣传，改制

⁷ 1955 年，联盟（国阵前身）为保证能在马来亚联邦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获胜，与华社代表在马六甲陈祯禄家举行了著名的“马六甲会谈”。联盟代表承诺执政后，修改《1952 年教育法令》，并拨款给华校供其发展。但大选获胜后，联盟政府却于 1956 年发表《拉萨报告书》，虽然保证不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媒介，但其第 12 条却规定：“我们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各族儿童纳入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教育体系。”同时报告书还将中学分为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两种，如果坚持以华文教学，政府则不给予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1957 年 3 月 7 日立法议会通过《1957 年教育法令》，将报告书的内容合法化。这个报告书成为将华文中学孤立到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源头，后来的 1960 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 年教育法令》，对中学都延续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法，使得华文中学面临着被改制的危机。

⁸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 (2) 条款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将一所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也就是说，华文小学、淡米尔文小学以及英文小学可以随时变质为马来文小学，将华小推到了极为危险的边缘。综上所述，战后至 60 年代出台的教育政策，涉及到华文小学、华文中学、教学媒介语、课程、津贴等等各个方面，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沉重桎梏。为维护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捍卫母语教育的合法权益，华教界人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抵制和抗议。

⁹ “最后目标”（ultimate objective）指的是“一种语文，一个源流”，即“国家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必须是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系统之下，国家语文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然而，我们认为，在朝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不能超之过急，必须循序渐进。”

后的中学还可以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基于这项条件，加上大部分华文中学当时面对经济拮据，所以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原有七十一所华文中学，只剩下十六所拒绝接受改制(郑良树，2005:179)，而成为“华文独立中学”。

从巴恩报告书¹⁰开始，当局就提出“国民学校”的概念，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政策无论是英巫兼重或是重英容巫，都一直围绕着这个框架，以便藉此政策而将其他方言学校边缘化。由于当时钟灵的要求和“国民学校”的要求很接近，因此钟灵的领导人认为在政府边缘化华校之际，这未尝不是条转折求存之路。1953年，钟灵申请政府津贴，当时受到华社的强烈指责。(郑良树，2005:397)

¹⁰ 1949年英属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以教育总监荷格(M. R. Holgate)为首的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1950年该委员会提出《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份报告》(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又称《荷格报告书》。该报告书建议国家制度要通过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来体现。由于受到了华社和马来社会的强烈反对而没有通过。于是，当局不得不分别调查马来教育和华文教育，随后出台两份报告书，一份关于马来文教育，另一份关于华文教育。

检讨马来文教育的是1951年巫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又称《巴恩报告书》。报告提出要废除淡米尔文学校和华文学 校，非马来人被要求“放弃对本族语文狭隘的偏护”，以便向更广泛的国家意识认同。报告一出台便受到华社的激烈反对。

1954 年，教育白皮书通过的时候，钟灵津贴金也谈判完成。钟中的举动引起了华社的不满，除了报章有着许多批评的文字外，华社各阶层纷纷采取实际行动，向当局抗议。当时先由教师层发起。钟灵的教师——孔翔泰及任雨农，前后先向当局抗议。孔翔泰在 8 月 4 日于槟城华校教师公会召开理事会，指责汪永年，对他有所批评。一个月后汪永年辞却主席职务。而任氏即在报章上以笔名严责钟灵当局举措失当，为华社招来莫大的损失。（郑良树，2005:408-409）

任氏说当时的华社，有 90%人反对。“他们都一再强调民族教育要掌握在自己民族手上，如果有人提议接受政府的建议，就被认为是教育汉奸。”（南洋商报，2009）让他尤其感慨的是，后来很多学校的校长都接受了改制的建议。因为其中涉及的利益如他们的职位是永久的，再不必看校董脸色，薪水也提高好几倍，生活更有保障等等。

表（三）战后马来西亚华校发展概况

年份	学校	学生	教员
1946	1105	172'101	4513
1947	1338	193' 340	5293

1948	1364	189' 230	5337
1949	1338	202, 769	5493
1950	1319	216'465	6245
1951	1171	206'343	6369
1952	1203	239' 356	6057
1953	1214	250'881	6748
1954	1236	252'312	7035
1955	1276	277'454	7606
1956	1325	320. 168	8435
1957	1347	391, 667	9663

资料来源：Federation of Malaya, 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Kuala Lumpur, 1946-1957. (林水椽 ,1984:309)

根据表（三）战后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发展概况，不难发现在以上的事件发生后，华文学校的学生和学校是逐渐增加了。

第二节 文化书法

马来西亚的书法团体均为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书法团体的成立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保存华人的文化传统，团结华人艺术家来共同发扬中华艺术；二是为志同道合者建立共同的平台和空间，用来切磋和交流。早期的书法社团数量少规模小，而多属自娱自乐性质。在马来亚独立前，总共只有四个与书法有关的团体。它们是南洋书画社、嚶嚶艺术展览会、檳城艺术协会和钟灵中学的书法研究会。八十年代后，马来西亚的书法蓬勃发展，各种书艺团体纷纷建立。此时的书艺团体，多数是一种向社会开放的组织形式，不再限于成员之间的自娱自乐。它们数量多，规模大，对整个社会书法活动的开展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其中最突出者有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吉中艺术协会、檳城书艺协会、柔佛金石书画协会、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等。

在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前，华文书法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为美术学院的创立。如 1938 年在新加坡创立的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简称南洋美专）。在水墨画系里，以书法的线条作为基础，所以举凡水墨画毕业的学生，皆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如水墨画家施香沱，不仅培育了水墨画人才，也间接培育了许多的书法人才。二为书法造诣较高的中国文人，他们南来之后，大多数在教育界服务。如孔翔泰，浙江宜兴人，在马来西亚执教四十年，他师承颜体

及赵体而创“孔体”，影响槟城一带的华人。李秀添的书风则影响雪兰莪及吉隆坡一带的华人。中国文人的到来，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文化的气息，为书法发展奠下基石。没有他们的到来，书法无法孕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华人社会只是将书法列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以艺术的方式来对待。故写字只是文人雅兴之事，擅于书法的文人对此淡然处之，也不以书法家自居。由于他们热衷于做诗填词，所以更倾向于诗人这个称号。

这一时期的书家有北马区槟城的陈郁之、汪其予、孔翔泰、管震民、周曼沙、崔大地；中马区吉隆坡的欧阳雪峰、林德辉、黄实卿、李达庭、李占如、陈兰生、江岳南。南马有王宓文、麻坡的陈人浩；新加坡有黄勛吾、张瘦石、俞龙孙、陈景昭、黄载灵、蔡梦香、施香沓等。

从艺术创作的趋向来看，这些书家都对书法有独特的见解和体会。惟能从传统书法跳跃出来者就寥寥可数，继承者占大多数。他们把书法作为一种人生终极价值的奉献，甚至是以一生的事业来对待。总的来说，这一时代的书家以文人为主，文化底蕴较深，书法韵味较浓，法度严谨，气象开阔。

任雨农是书法家亦是一位教育家，立志以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在书法家分期中，任雨农是属于马来西亚华文书法发展这一时期，实际上离蔚成风气仍然遥远，唯有一些书家，仍临池不辍。这时期的书家有北马槟城的黄尧、萧遥天、陈瑞样、庄家训、竺摩法师、任雨农，吡叻的郑一峰、陈光师、沈亭；吉打的蓝光。中马吉隆坡和雪兰莪有李家耀、黄石庵、李秀添、杜存礼、胡朝拱、伯圆上人、黄国彬。柔佛有梁荒谷、张允鹏。东马砂劳越有孙莘农、潘煌；沙巴有翁桂清、罗国泉、苏伯瑶等。

这一时期的书风，面貌多样，有崇魏碑的，有崇帖的，碑帖结合者亦有之。崇魏碑者如郑一峰、黄石庵、伯圆上人及苏伯瑶；崇帖者有彭士麟，碑帖相结合者有潘煌、孙莘农、竺摩法师等。但是主导的书风还是以碑为主，崇尚雄浑、博大、厚朴、古拙的审美观仍然没有改变。

从艺术取向而言，继承传统者多，但是却开始意识到书法不能仅停留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上，应该往艺术方向发展。他们当中，大多从传统中提炼所需的养分，推陈出新，既有所宗，亦有所法，不失书法韵味，各具面貌。如黄尧的从钟鼎、甲骨提炼出行云流水的线条；竺摩及伯圆从弘一书法中截取结构，套上自家笔法；

郑一峰从魏碑、金石获取其雄浑、磅礴之气；苏伯瑶从《郑文公碑》里，将笔法消化，别出面貌；李秀添取汉碑之骨架，吸魏碑之雄浑，而奠定其书风。

这一群书家当中，除了黄国彬是土生土长以外，大部分都是中国南来的文人。他们在马来西亚生活却已将近十年以上，或多或少也都受西方艺术倾向所影响。马来西亚虽然独立了，但英伦文化的影响尚存在。西方艺术追求革新、创意，一直影响着这群书家。他们对浸淫在历史遗存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去体验及品味字里行间的笔墨技巧和古典情怀及视古法为圭臬的做法，已有所保留。

从事书法工作的人，除了陈光师以外，其余的书家都是业余书者，而且大部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退休以后，专心钻研书法，并积极推动与参与书法的发展。八十年代，是他们做出贡献的年代。没有他们孜孜不倦的付出，就无法造就现今年轻的一辈。

小结：任雨农文化教育者的角色

任雨农是马来西亚著名的书法家、作家，更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任北海中华四校校长，檳城钟灵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华文教席，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范学院，南北马华假期师训班华文，中国文学及教育讲师。任氏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华文教育、华文报纸、华人社团素来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在三者之中，华文教育担负了保存华语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深深影响了华族的发展。任雨农曾说过“华族生命系于文化，文化传承端在教育教育兴庆在师资，师资贞贤天地良心。日月炳照毋添炎黄。”（刘庆伦，2013：19）反映了老一代海外华人的高尚品格：自觉以弘扬中华文化、推广华文教育为己任，没有索取，只有奉献。他的精神实属难得和可贵。

第四章 任雨农教育思想的实践

笔者以任雨农作为此论文的研究对象，从《任雨农全集》上册、中册和下册作为研究蓝本探知任雨农的教育思想的实践。以下的章节，笔者将以任雨农对华文教育、推广华语问题和书法运动，三方面去解读任雨农的文化教育责任。

第一节 生命孕育生命：一生心系华文教育

“教育”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孟子》〈尽心篇〉，提到“君子有三乐”，其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外，“教育”在中国古代是指上位者以良好的榜样提供下位者模仿，表现出其良善的行为。在西方，教育的英文和法文皆为“education”，字源自拉丁文“educare”，是“养育”或“引出”之意，是用引导的方式将潜能开发出来。

四十年来，大马华社尽管被限制在固定的框架内，但是，大马华社依然本着过去独立发展、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儒家文化上作出贡献，这里简单地举几件事来说。

首先要谈的是七十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六十年代华文中学纷纷改制，很多都成为政府中学，华文中学教育受挫折以后，华文教育一蹶不振，中华文化即刻失掉了半壁江山。华社痛定思痛，在七十年代初叶即发动全国性的独中复兴运动，波澜的壮阔，气势的磅礴，比新加坡的儒学运动还要雄伟。经过几年的努力，华文中学起死回生，重新活跃起来，站回原本的岗位，重建儒家文化传播站。

接下来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从 1984 年开始，华社轮流在各州主办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华人文化节，如今已达二十届，从无间断，一年比一年旺；内容包含了视觉、听觉乃至书法、绘画及文学等华人艺术文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某一些层面的整体展示和表演。

为了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大马华社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不断在争取大专教育的增办。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争取，也不知经过多少挫折，华社民办学院终于得以完成，虽然那已经是接近千禧年的事了。如今，大马华社已拥有三所民办的学院，分别矗立在南马、中马及北马，而且充满活力，正为教育及学术迈开脚步。

在教育政策上，任雨农秉持了爱护华教的精神，抗争不熄。在教学上，他重视以人为本，用生命影响生命。在他看来，教育须符合时代。他曾说过：“今天华文程度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是华校还选一些老子、孔子、孟子的论著做教材，不但学生不易接受、不明白，讲句不客气的话，教华文的教师本身对旧体文学的认知恐怕也有所不足。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读不下来，你叫他怎么样去解说？”。（何雪琳，2009：14）

他所谓的“教育”是要使人人有勇气有智识确保自己本身的民族特性（精神于文化），进而认识周围的环境，认识时代的变迁，进而又有足够的力量不让别人操纵自己，不让别人糟蹋自己。（刘庆伦，2003：28-29）兴办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发挥教育的正义精神，不让公平屈折，不让真理隐藏，让人民在学问的领域中自由竞争，不让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枷锁去束缚他，即使是些微的影响也不应有。（刘庆伦，2003：28-29）人民在法律范围内读自己的书，籍知识加强智慧，以培养他本身民族气质，成为一个有良知良能的公民，彼此尊重，共同爱国，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刘庆伦，2003：28-29）

任氏一生心系华教，只要话题一触及华教，任老双眼闪烁着光芒，精神却荡漾着忧悒。他曾经非常懊悔南下的决定，不过，他在饱尝人间冷暖哀乐之余，却笑言自己“若是北上的话，恐怕连命都没了。”从容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尽他人生的小

缩影。只有身历其境，才能知道个中滋味，也因为经过这些岁月洗礼和人生的历练，才使他的人生更丰润、缺中有满。

第二节 华族的根：扬弃方言，推广华文

“语文乃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与华人族群的关联透过华文华语得以体现。传承母语教育，是整个马来西亚华族的任务，它代表着民族的根源。在任氏的一生中，他积极地提倡母语教育，即华语运动。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而民族精神应包含：

一是族的独立性

二是民族的气质尊严

三是民族的斗争，而民族斗争指的是生存的斗争，生活的斗争，开发拓展的斗争（刘庆伦，2003：457）

扬弃方言，消除同胞间的隔膜，破除陈旧观念，革新地方色彩。提倡华语，融合全族同胞的感情，焕发新精神，应对新的时代局面，是整个华文运动的大主题。任氏曾发表文章，多次谈及有关华语与华族的关联性、华文的优点、好处和推广华文的意义等等。如〈扬弃方言，推广华语〉中，他认为华语的优点有以下五种：

- 一 是华语有丰富的词汇
- 二 是华语有统一性
- 三 是华语合乎语言学
- 四 是华语合乎语音学
- 五 是华语合乎语法学（刘庆伦，2003：458）

上段提到，“扬弃方言，推广华语”。有此说法的出现，自然是方言太落后了，缺点太多了。然而讲华语有些什么好处呢？任氏也针对以上的疑问，做出解答。他认为讲华语的好处是：

- 一 华语是整个民族同胞的心声
- 二 华语最能融洽全族同胞的感情
- 三 华语是促进思想交流最好的工具
- 四 讲华语可以促进民族语言的统一
- 五 讲华语可以提高语言水平
- 六 讲华语，语言文化赖以提高（刘庆伦，2003：458-459）

在整个推广华语运动上，任氏是积极，身动力行。他以新加坡全国上下推广华语运动的热潮作为正面教材，积极推广华语运动。据他的说法，推广华语运动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 一 取缔复杂落后的方言
- 二 消除同胞本身的隔膜
- 三 避免语言隔阂发生的误会
- 四 抛弃落后的地方观念
- 五 扬弃陈旧的意思
- 六 改变个人散漫的态度
- 七 对全体华裔同胞注入新观念
- 八 扩大华裔同胞的时代视野，生活视野，文化视野
- 九 开导华族同胞勇敢的抛弃旧包袱，接受新知识
- 十 激励华族同胞敬业乐群，力争上游
- 十一 提醒华族同胞以群体力量肩负生活担子，时代担子，历史担子
- 十二 唤醒华族同胞对新于旧，优于劣，公与私，个人与种族之间知所识

别，更要有卓绝的眼光与精神对付新的局面（刘庆伦，2003：459-460）

除此，任氏认为在推广华语运动期间，更不能忽略文化和思想这问题。他强调：

“扬弃方言，推广华语，这只是华族问题的一部分，是属于表层；提高华族的华文水平，扩大生活视野，注入时代思想，严肃民族精神，才是华族生存的中心，才是正本清源的主题。”。（刘庆伦，2003：460-461）

综上所述，如果华文运动只局限于一种母语的推动，它是有其局限和狭隘。整个运动的鼓吹，应该有着严正的态度，明确的目标，涉及的不单单是语言而已，它更是以一个民族的尊严和思想，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作为大前提，是一种文化的推动。

任氏认为语言文学是民族性的产物，语言文学里有着“民族气质”，更有“民族尊严”，维护和发扬“民族气质”与“民族尊严”就只有依赖教育的力量。而教育的内容以及推行教育所用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那个那个民族的存亡及其前途。

（刘庆伦，2003：24）

第三节 传承与继承中华文化：推行书法运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任雨农在献身华文教育，以教授华文传承文化以后，他更积极推动书法运动。这可能是由于他多重身份所导致。他除了在马来西亚教育界是位著名的人物，他同时是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从隽秀飘逸，到反朴归真，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充分表现出他的高雅气质及文学修养。他和方北方、温梓川和周曼沙四位被人称之为槟江四大才子。槟城早年人才辈出，槟江四大才子是华族文化界翘楚。有一段时期，任老并不鼓励海外华裔子弟学习书法。他说：

“我自己热爱书法也从事华文教育工作，只是在考虑到西方的科技发展迅速，一切讲求效率，而华人因为文字难学难写，浪费很多时间；再加上海外华人子弟课业繁重，像马来西亚学生就要兼学华、巫、英三种语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对学生学习书法。”（何雪琳，2009：14）

但近年以来，任老的看法却彻底的改变了，他开始鼓励华裔子弟学习书法。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如果华人不坚持本色，掌握好自己的文字，很容易被别的民族所同化。而重新鼓励华裔子弟学习书法即是其中一种维护民族本色的途径。

（何雪琳，2009：14）他认为要写好书法，首先一定要先读书，这样才能带动社会人士及学生进一步去了解 and 认识自己的文化。任氏一箭双雕的远大观念，可见他对推动华文教育和维护民族文化的确是下了一番苦心。

任氏的书法形态多变，圆中见方和方中带圆，奠定了他在书法界的地位。他的书法更成为书法妙境的最佳体现。他专学颜真卿，数十年如一日。（何雪琳，2009：14）他曾先后受邀为槟城槟安医院义展，为教育机构义展筹款。其中在槟州大会堂为新纪元学院举行义展，由当时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反应热烈，筹得义款达 50 多万零吉。（何雪琳，2009：14）他一生酷爱书法，退休后更日日练字强身强精神，丝毫没有放松。他的书法在 1987 年已入选中国北京翰苑碑林，位列当代文化艺术作品，供人收藏，传扬后世。（何雪琳，2009：14）其作品在 1993 年获得中国颁赠“北京书法艺术荣誉奖”，尊定他的书法在国际的艺术地位和荣耀。（何雪琳，2009：14）任雨农收藏了许多名家书法作品，他的子女准备为他设立书法纪念馆，收藏他和其他名家的墨宝和开设书法展。

小结：一生推动华文文化教育

任老一生以“老派中国人”作风行事，以身为炎黄子弟为荣。在家，他为孩子取名亦取字取号，在餐桌上也经常议论国政。在外头，他的嗜好是与三五名知己

畅谈国事、天下事，步步追踪时局。任老的长女任蕙文在任老逝世时透露，任老一生的追求“品格清高”的教书先生。作为一代书法大师的女儿，任蕙文退休后一直跟着父亲学习书法，期待“父女同台”共开书法展，可惜美梦难成。

所谓“无求品自高”，任雨农对华教华社华族文化的关爱与关注，整十年来如一日，纵有百般不舍，但套用他素来说过的一句话“走了无所谓，因为一定会有人可继续发扬华族的文化”。一语道尽华族文化与教育“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涵义。

第五章 结语

每次我们提到任雨农，大家都会认可了他在华文教育的贡献。没错，任氏一生最大贡献是在华文教育，为文教团体如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宽柔华文独立中学及新纪元学院等举行义展，也经常在报章上发表杂文、论说文、散文，是家喻户晓的文化人，声望甚高。退休后，他才专注于书法，经常担任槟城州内及全国性的书法比赛评审。他一生默默地为华文教育付出心血和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然而，在他心中，“教育”这两个字到底是蕴含了怎样的一个含义？在他看来“教育须符合时代。”话题一触及华教，任老双眼闪烁着光芒，神情却荡漾着忧悒。他曾经非常懊悔南下的决定，不过，他在饱尝人间冷暖哀乐之余，却笑言自己“若是北上的话恐怕连命都没了。”（何雪琳，2009：14）从从容容的一句话，却不知经历多少岁月洗礼。也许，只有身历其境，才能知道个中滋味，也因为这些历练，才能使他的人生更丰润、缺中有满。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能够坚持下来，蓬勃发展，是同一代代有识之士坚忍不拔分不开的，而任雨农先生正是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担任过多所华文中学的教师和校长，几十年如一日，克服困难，身体力行，推广华文教育。退休之后，他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仍在为华文教育大声疾呼。任老为当地华文教育呕心沥血、默

默耕耘了一生，但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总是自责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他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节 马来西亚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中华民族大义与传统文化对任雨农的影响至深，这特别反映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他的书法成就：1986年作品参展亚运纪念国际书法联合展；1988年作品入选中国翰园碑林；1988年参加首届亚洲美术联盟马新书法交流展；1989年参加韩国国际书法交流展；1990年新加坡国际交流大展；1991年韩马书法研讨会；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书法个展。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如编著作品有：《风雨南州》论说文、《江山灵秀》杂文、《青山云外》散文、《生活的旋律》“小品文”、《江山万里行》游记、《乱弹曲》论说文、《湘芬堂诗词集》、《海天云外》、《任雨农全集》上、中、下三册。

社会各界对任雨农的赞誉及评价也是极高的。1938年，创办“南风杂志社”出版《南风杂志》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在二战后，受聘为北海中华公学校长，在槟城钟灵中学、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在吉隆坡语文学院及师范学院当中国古典文学讲师。1947至1952年间，任太平、吉打、怡保、新山等华校假期师资训练班华

文、教育学讲师。1970年退休。2001年7月获槟州元首封赐 DPMN 高级拿督勋衔。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保存，复兴与发展使它成为马来西亚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育源流。中文人才是市场上可贵的人“才”资源。它更以稳健的脚步向前发展，人才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而中文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具有活力的华文体系，中文人才就更为可贵和稀有了。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华文已跃升为仅次于英文的重要商业用语。东南亚其他国家因政治或种族的原因压制或消灭华文教育，所以他们在发展与中国庞大的经济关系的时候，失去了中华文化资源，而马来西亚则可以尽量利用原有的双语（华文与英文）人才的优势，赢得经济竞争的尖端。任老走在维护华文教育的这一条路上，以身教立行教育马来西亚的孩子认识中文，教育孩子学习中华文化，在教育栽培上，他贡献良多，就如上文所提及的。贡献是一种很抽象的字眼，我们无法一一结算，但可以肯定的是，任老在教育和培养中文人才是有贡献的。

第二节 任雨农教育思想的影响

任雨农儒家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显然带出了中国的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它始终把人才的培养、人格的铸炼放在首要地位。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

一的《大学》，就这样明确地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1983：1）即是说，教育的道理，在于使人们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在于使人们互亲互善，使一切行为准则尽善尽美，以达到最高的思想境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学》不仅提出了育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条纲领，同时，又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方面对人格铸炼提出了具体要求。

唐朝韩愈的《师说》在我国教育史上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一开头就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阴法鲁，2011:470）在这里他把德育的任务一分为三，后两者的“授业”、“解惑”是具体的、可指的，而首要的“传道”，则是抽象的，整体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整体体现。这里所说的“道”，包含了正统的思想和道德等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无论怎么说，培养人才，铸炼人格，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第一要义。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独特魅力所在。

任雨农是中国大使馆的老朋友，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常穿梭于马中之间，到北京，去长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胡正跃回忆任雨农的文章中有这么写道：

“任老为当地华文教育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了一生，但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总是自责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记得他在给我的信函中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六十余轉外沉浮，无益于华文教育，祖宗。于今九二暮年，尚复何言！”（胡正跃，2009）

这么短短的一段话，就道出了任雨农的心声。

任雨农曾说过“华族生命系于文化，文化传承端在教育教育兴废在师资，师资贞贤天地良心。日月炳照毋炎黄。”（刘庆伦，2003，19）这段话，印在《任雨农全集》的书籍的背面。的确，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任雨农是位重要的人物。他反映了老一代海外华人的高尚品格，自觉以弘扬中华文化、推广华文教育为己任，没有索取，只有奉献。他的精神实属难得和可贵。

任老身在南洋，心怀故国。根据胡正跃大使的记载，任雨农总会表达在自己的文章和诗词表达心情，他强调“六十六年情怀故国”，并引用李白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来表达他对故国（中国）的永恒眷恋。身为一位南下的先辈，他有着对故国的思念，却把一生奉献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土地上，其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他担任过多所华文中学的教师和校长，几十年如一

日，克服困难，身体力行，推广华文教育。退休之后，他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仍在为华文教育大声疾呼。

第三节 此课题和目前局限及未来发展

历史可以培养国民对国家的承继，也可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了解。华人对马来西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这贡献必须由文字记录下来，受到各方的承认与肯定。同时，华族先辈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传承下去，以备对马来西亚将来的发展能作出更大的贡献。近年在华社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华人历史纪念馆、如陈嘉庚纪念馆、华裔博物馆（华总）、中华人文书法碑林和林连玉纪念馆，甚至有学术研讨会的产生和复兴汉服运动。这些都反映出华人在追溯自己的历史，尝试找回“根”，让我们下一代记得先贤们在马来西亚这一片土地的贡献和成就。

然而，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我们虽有一批优秀及执着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如林连玉、严元章、沈慕羽、陆庭谕等人，包括此论文研究对象任雨农。他们之中不乏饱学之士，对传统国学，儒学皆有了解，但他们能力所及仅在于唤醒华社对华文教育、母语地位及权利的注意，并领导华社为这股权益奋斗。虽然如此，他们努力的结果，起了惊人的作用，创造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奇迹。可惜的是，他们的

能力也局限在引起注意和努力争取的阶段。事实是，他们的努力是否真正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华文教育能否因此永恒发展。

廖文辉表示教总前任主席沈慕羽局绅曾说：“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廖文辉，2007，25）绝非耸人听闻，谬误，以为维护华教，即是发扬中华文化。事实上这不过是基础工作，与发扬中华文化还有一大段距离。至于华文程度低落、研究机构缺乏、资料图不足、学术商业化倾向、急功近利思想、资金不足，都缓慢“启蒙”的步伐。大马华人文化的发展，可谓处在环境、图书、学者严重不足的境地。近来，回儒交流炽烈，俨然为学术界主流，这对华社而言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华社至今仍未为自身文化寻求定位，大方向也未确立，试问我们拿什么与他人交流对话。（廖文辉，2007，25）这么短短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随着华文教育的发展，中华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文化的优秀特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宝贵财富，要传播中华文化特质，使之发扬光大，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教材的力度。如前所述，华文教育的对象国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受到影响不同、学华文的目的也不同，这些差异需要多种类型的教材。有些内容陈旧，语言训练未能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多面的要求。应该根据需要，作出编写各级各类教材的规划，然后组织力量进行编写筹划，既要考

考虑华文教育的普遍性,也要考虑针对性;既要突出语言教学,也要兼容中华文化的延续发扬,语言与特质要融会贯通。其次加强师资培训。

以史为鉴,勿忘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融入了那个民族的精神代代相传,这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力量和继往开来的精神财富。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苍白的,是没精神支撑,也是没有前途的。

研究任雨农也表示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一个民族只有深入了解民族的根源才能强大伟大。历史印证一切。站在“数典不忘祖”立场,研究先贤南来的实况,确实有其价值所在。它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要让我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像大树般扎根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并站得更高和更稳。

参考书目：

巴素（1967），《东南亚之华侨》（上册），台北：国立编译馆。

蔡佩蓉（2002），《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陈荣照主编（2003），《儒学与世界文明》上、下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陈德华（2003），《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刘京海与成功教育》，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2003），《陈嘉庚新传》，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陈蒙鹤著、胡兴荣译（2008），《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崔贵强（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戴小华主编（2006），《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Emerson, R. Rupert（1998），*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uala Lumpur.

Francis Wong Hoy Kee, Gwee Yee Hean(1984), *Key On Malaysian Education - Highlights of the CAP Seminar o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Kua Kia Soong,(1990), *Reviewing Malaysian Education*,华社研究中心 The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何国忠（2005），《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何国忠（2003），《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何国忠（2002），《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柯嘉逊（2002），《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董教总教育中心。

柯木林、林孝胜（1986），《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方山编撰（2005），《马泰边境区风云录》（第一集），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何启良（2015），《马来西亚人物志》，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何雪琳（2009年12月24日），〈师范永存〉，《南洋商报》，pp14。

胡正跃(2009)，〈六十六年情怀古国〉，<http://www.xzbu.com/1/view-3188363.htm>。

[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陈育菘主编（1947），《新嘉坡风土记》，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廖文辉（2007），《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林开忠著（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刘庆伦（2003），《任雨农全集》，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

林水椽、何国忠合编（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

林水椽、骆静山（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总会。

刘京海著（2002），《成功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Mahatir Bin. Mohamad(1997), *The Malay. Dilemma*,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Tan Liok Ee（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莫顺生著（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144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及林连玉基金。

甄供著（2006），《华教春雷林晃晃》，吉隆坡：董教总教育中心。

Shu Yan—Tsiao & Ser-koon (ed.)（1984）, *Malaysia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 Singapore.

Wang Gungwu（1992）,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颜清煌（2001），〈序〉，李元瑾著，《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

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颜清湟（2008），《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王秀南（1970），《星马教育泛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叶新田著（2007），《千磨万击还坚韧》，吉隆坡：叶氏公司。

叶钟玲（2001），〈新马华人对厦门大学的经济支援（1926-1937）〉，载于李元瑾编（2011），《南大学人》（pp191-230），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阴法鲁（2011），《古文观止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岱年著（2006），《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良树著（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郑良树著（200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吉隆坡：董教总教育中心。

周聿峨（1996），《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暨南大学出版社。

庄国土主编（2011），《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四期（总148期）厦门：厦门大学《南洋问题研究》编辑部。

[宋]朱熹撰（1983），《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附录 1:

任雨农简历

先生名雨农，字湘圃，1911 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1934 年至 1937 年 4 月任教湖南醴陵女子师范，曾于湖南《国民日报》发表一篇《政治人物左右教育》的教育论文，几乎招来文字祸。遂于 1937 年 5 月南渡马来亚槟城。翌年，开始在《现代日报》、《光华日报》发表作品，撰写论文、散文、和其他小品。

1938 年 4 月与朋友在槟城创办《南风杂志》，担任总编辑，呼唤海外侨胞支援祖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因为言论不合帝国主义的立场，殖民政府下令禁封，不得已于 1939 年 10 月宣告停办，转而投身教育界，厕身于“孺子牛”之列。1940 年到 1941 年，当郁达夫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暉与繁星时期，任氏发表不少散文和小品，间亦抒写旧体诗词。

3 年 8 个月东南亚沦陷期间，任氏与夫人陈月莲于太平市郊外的树胶园里，胼手胝足製作虾饼出售，艰苦渡过战乱岁月。

日寇战败投降后，任氏受聘为北海中华公学校长，之后任教槟城钟灵 中学，后来受聘于太平华联中学，继而受教育部推选出任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范学院中国古典文学讲师，自 1947 年到 1962 年期间，任氏受教育部聘请，兼任太平、吉打、槟城、怡保、新山等华校假期师资训练班华文、教育学讲师。于 1970 年退休。

任氏出版之作品：

- 一、《风雨南州》（论说文，1982，1984 再版）
- 二、《江山灵秀》（杂文，1985）
- 三、《青山云外》（散文，1986）

- 四、《生活的旋律》（小品文，1990）
- 五、《江山万里行》（游记，1990，稿酬 12,000 元捐献钟灵独中）
- 六、《乱弹曲》（论说文，1993）
- 七、《缩不住的春风》（新诗，1997）
- 八、《湘芬堂诗词集》（旧体诗词，1987）
- 九、《任雨农书法集》（1997）
- 十、《海天云外》（2000 年 10 香港大公报出版）

任氏的书法，曾见于河南省开封碑林，河南省荥义市杜甫碑林，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馆，湖南省名人博物馆。

1992 年任氏为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书法义展筹款 50,000 元。同年 10 月为 新山宽柔中学义展筹款 20,000 多元。1993 年 12 月应邀于新加坡大会堂举行书法展。1994 年应邀于新加坡举行“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及其思想研讨会”（台湾师范大学主办）。1997 年 5 月于吉隆坡公主酒店举行书法义展，筹得 260,000 多元悉数捐赠新纪元学院。1998 年 11 月假檳城州大会堂举行书法义展，筹得义款 320000 万馀元，悉数捐酌新纪元学院。

1991 年中国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中华侨杰列传》，任氏名载传中。1993 年荣获中国北京书法艺术荣誉奖。1997 年荣获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荣誉奖。由于卓越的才华与文学创作。1995 年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荣誉文化奖。1996 年 4 月 6 日，受中国陕西师范大学盛邀前往参观，并获该大学校长赵世超教授聘为名誉教授。

2001 年 7 月，檳城州州长赐封 DMPN 高级拿督勋衔。任氏以閒散之身，仍然担任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檳城赤道艺术学院顾问，檳城檳榔艺术学院顾问。

2003年3月23日，集合文化、艺术、教育、工商以及政经界的社会贤达、闻人雅仕，为表扬任氏作为文教界瑰宝，在文教事业顷注一生心力的贡献，以及默默耕耘的精神，隆重出版上、中、下册《任雨农全集》，并举行系列研讨任氏思想之讲座会与书法回顾展。

附录 2:

(由儒家思想谈起)

西化后的反思

想来该不是主观的说话吧，新加坡这个一贯“西化”的国家，忽然倡导“儒家思想”来，于是新加坡的学术界，还有好些文教团体，循声响应起来，“儒家思想”的研讨会，演讲会，以及有关的理论文章，相当精彩，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味道，虽然不能说是全部人民都会耳目一新。从社会进化论来说，一种思潮，或者是一种运动，甚至一种政策，如果到了极限，总难免会出现“反动”，对现行的制度不满，感到厌倦，感到前途暗淡。执政当局 看出来，于是想开出一条新路，松弛人民的紧张情绪，不想看到溃缺的难堪局面，这是许多政府都会有的警觉。何况新加坡的人民约八十巴仙的人口 是华裔，搬出华裔的圣人金字招牌“孔子”，以及孔子肇衍下来的“儒家思想”，也是有他们的一番苦心。“为政在民”，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不能说他们没有这一眼光。但如果说到“为政在民”的政治节操与政治气度，那就必得讲事实。

令人惊奇的是，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国家，而巫族同胞佔了人口的大多数，却有华人政党领袖，而这些领袖又不大认识方块字，似乎都是从“西化”裡陶化出身，他们居然也喊起“儒家思想”来，不让南端彼岸的国家政治领袖专美。你可以表明你的身份系出炎黄脉络，我同样系出炎黄脉络。孔子是你我大家的圣人，他老人家的思想学说，是陶化子孙人格的模型，拯救日益沉沦的世道人心，是必要的良药，也是防范滑落的政治支援力量，看作是另一支柱，醍醐灌顶果真有这份力量吗？那就得拭目以待！“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古人对时局纷乱，人民疾苦所发出来的呼喊声，我们总希望她成为绝响，往后的日子是白日青天，大家和平的平等的作智慧上的公平竞争！

有时，人会莫名奇妙的糊涂起来，就是庄子说“芒”（昏昧），而我更是芒而又芒了。我里不明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摆出民主、自由、人权”的铁律，要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一体奉行，不听话吗，制裁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齐出

动。为什么东合的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境内的华人政党，不谈“民主、自由、人权”，却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借用过来呢？是不是“西化”到了极端，察觉出有点不妙，摆出一幅“血缘”态势，希望凝聚力量堵住海浪的侵蚀。而我们大马痘一方面呢，政治情势一届不如一届，何妨请出文化老祖宗来，在“儒家思想”的督导下，大家认亲，认黄河一脉的亲情，同舟共济，不失为救人自救的法门。从政治上来说，他们通过“儒家思想”的沟通，这一番苦心，也是值得同情的。不过，什么是“儒家”？“儒家思想”的思想体系又是什么？澈头澈脑西化的李光耀，吴作栋这些政治精英，他们知多少？知道了领悟了又如何去体现？如何体现到现实情况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一般的看法孔子是儒家之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儒家学说思想的荟萃。儒家思想的精义，都在这四部经书里，等待你去认识体会。认识了它的精义，体会了它的内涵，还是不够，要看你如何去体现，如何体现到现行的政治上，制度上，没有不平、不公、不均、不安，全体人民心平气和的愿为国家出力，愿意看到自己国家达到富强局面，这也是孔子的意愿。他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孔子生在变乱的时代，他非常同情人民的痛苦，他很想积极地利用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核心，在“论语”裡面有关“仁”的资料，如：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核心

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2.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3. 子张问人与孔子。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4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5 刚毅木讷近仁。

6 巧言令色，鲜矣仁。

7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8 仁者，先难而后获。

从这些辞句裡面可以看出仁的涵义，是一种克己而为人的利他行为，也就是“亲亲而仁民”的意思。他要人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行为和心机，养成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你能存心牺牲自己，不惜“杀身成仁”，那还有什麼好怕呢？还有什麼不敢做不敢为的呢？所以他说：“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当仁不让于师”。

然而，孔子的仁，是有等次的，说得太难了，谁也不肯做，所以他教人“能近取譬”，或者叫人去和仁人一道慢慢地濡染，这就叫做“亲仁”，也就是“里仁为美”。人谁都会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这是私情，还不够，应该推广开去，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假如推广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你能确实实照顾到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利益应该包括生活、文化、教育、经济以及平等权利，这才可以说是“仁”的极致！

（孔子的教育两翼）

一是学，主观上强调学，学不厌；

一是教，客观上强调教，教不倦。

时代演进到今天，我们来谈孔子，不怕被人讥为泥古吗？因为在二十年代一段时期，曾有过“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而九十年代后的今日世界，从政治观点来说，讲求的是飞弹与激光实力：从思想观点来说，那便是民主、自由、人权：从科学观点来说，则强调电脑、电子、微子：从艺术观点来说，是寻求美的境界。话虽这样说，但是，真要希望社会进步，还是要靠教育，只有教育，才能激发人类的智慧，才能孕育人类的情操。孔子的教育理论，教育内容，它的内涵价值，对于今天的横流人性，淫念强烈的人心，是有其遏止匡正的力量。当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孔子的学说与思想及其事迹，有美化和傅益的地方，也有曲意污蔑的地方。读者本著纯学人立场去探寻去辩正，相信是有益的。

好古好学的精神

孔子生于变乱的时代，诸侯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十分剧烈，奴隶制虽然崩溃了，封建制也日趋瓦解，他很想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利用文化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孔子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发现了“人”，要把他人当成“人”，自己才能成为“人”，而人的真意义应该包括个人的尊严，生存的权利，生活的独立与自由。要做到这一地步，最要紧的便是要学，人是具有学的本质的，在道义上应该学“仁”，在技艺上应该学怎样才能达到“仁”的目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单凭意愿就可以成功，所以他强调学。学些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固然都在学的范围之内，而他所注重的是历史。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好古敏以求之”，他是有接受古代遗产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把一些古代人物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过于理想化了。“托古改制”的一片苦心却未能如愿，因为时代因素限制了他，使他栖遑，使他一生郁郁。

孔子除了“好古”之外，他也“好问”，“好问”是求学增识广见的好方法，“就有道而正焉”，“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道德性的，政治性的，都可以学，都可以问，他的问学领域是广阔的，他没有偏见，没有把自己关在狭隘中。孔子的为人为学，是实事求是的，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主张“多闻缺疑，多见缺殆”。又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顺序)也”。

这是注重客观观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可见他反对冥想，反对唯心的思维方法的。“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非生而知之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便是强调学。他的“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表示他一生都在敏思求学中生活，可是他无法突破那时的时代性。

孔子对于人的天资的看法，似乎有商榷的地方，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斯为下焉。”他又说：“上智与下愚不移”。说到生而知之的天才，这是廓于天才论，也是十分难见到的，无论从生理学与心理学上来看，是非常不可能的。至于上智，这是智慧高，领悟力特别强，确实是有的，但要有最优良的教育(家庭与学校)相辅助，才能有成。说到下愚吗，这是幽于早期性的痴呆症，即使有最先进的医学也是没有办法的。孔子自己也坦白的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他强调“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的步骤。“困而学之”与“发愤忘食”，正是坚毅的探寻学问的精神在激励他。

关普及教育的先河

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一个真正有高远理想的人，其思想、眼光、德操、学问，应该是广受世人尊敬的。孔子，他眼见那个时代一班特权阶级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力，而广大的平民却不幸被摒弃在“愚民”之列，于是他个人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开创了后世普及平民教育的先河。他的教育科目分为四教：文〈文学〉、行〈德行〉、忠〈政事〉、信〈言语〉，四科是：“诗、书、礼、乐”。诗经是他一部极重要的教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

诗，无以言”，可见他特别注重诗教，诗教就是情操教育，就是心理学裡面的美学。学诗，可以增广知识，可以从政，可以应用到外交上。由于诗经裡面有咏叹民间疾苦，有各国风尚的敘述，有史实殷鉴，有政治哲理，还有有人心性的邪正。

孔子也特别注重音乐，他喜欢弹琴、鼓瑟、唱歌，“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他对音乐的用心，他有时陶醉在音乐中，他把音乐视为自我修养和对门人的情操教育，“与民偕乐”，他把音乐推广开来使人民共同享受，他充份了解艺术的价值，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神。

孔子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不是机械式的，“因材施教”，他的施教是著重学生的天性、资质、勤惰以及兴趣和志向，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总希望学生受益，希望学生的气质逐渐提升，这样崇高的教育爱心，所发出的光对后世有没有起激发作用呢？但我总希望“因材施教”的灵活教学法益以今天的科学智识，在教学进程上能收到真正效果。